

休谟怀疑论对康德先验哲学的影响

郭雅琳

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8日

摘要

休谟的怀疑论在近代哲学中具有根本性的挑战意义, 其对因果性、实体及归纳法的挑战(《人类理解研究》)动摇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根基, 迫使哲学重新审视知识的来源与限度。康德承认, 正是休谟的怀疑论将他从“独断论的独断性预设”中唤醒(《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并促使他发展出先验哲学体系。本文旨在探讨休谟的怀疑论如何具体促成康德的“先验转向”, 并分析康德在何种意义上回应并超越休谟。首先, 休谟对因果必然性的否定揭示了经验归纳的或然性, 使康德意识到, 若知识仅依赖经验, 则普遍必然性无法得到保证。为此, 康德将休谟的“因果性问题”转化为“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 并通过先验范畴重构知识的必然性基础。其次, 康德并未全盘接受休谟的怀疑论, 而是以先验观念论划定理性的界限, 既承认经验知识的有效性, 又保留理性批判的可能性。然而, 康德在限定知识界限时设定的“物自体”概念, 使其体系在认识论边界处产生了未能消除的内在张力。本文认为, 休谟的怀疑论是康德批判哲学的必要前提, 而康德的回应既是对休谟问题的修正, 也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这一思想史转折不仅影响了德国观念论的发展, 也为现代认识论提供了持续讨论的框架。

关键词

休谟怀疑论, 康德先验哲学, 先验转向, 认识论

The Influence of Hume's Skepticism on Kant's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Yalin Guo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August 17,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9,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8, 2026

Abstract

Hume's skepticism holds a subversive significance in modern philosophy. His challenges to causality,

文章引用: 郭雅琳. 休谟怀疑论对康德先验哲学的影响[J]. 哲学进展, 2026, 15(9): 265-271.

DOI: 10.12677/acpp.2026.159447

substance, and induction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undermined the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compelling philosophy to re-examine the sources and limits of knowledge. Kant acknowledged that it was Hume's skepticism that awakened him from the "dogmatic slumber"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 and prompted him to develop the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system.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Hume's skepticism specifically contributed to Kant's "transcendental turn" and analyze in what sense Kant responded to and surpassed Hume. Firstly, Hume's denial of causal necessity revealed the probability of empirical induction, making Kant realize that if knowledge were solely dependent on experience, universal necessity could not be guaranteed. For this reason, Kant transformed Hume's "problem of causality" into the question of "how synthetic a priori judgments are possible" and reconstructed the necessary basis of knowledge through transcendental categories. Secondly, Kant did not fully accept Hume's skepticism but instead delineated the boundaries of reason with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cknowledging the validity of empirical knowledge while preserving the possibility of rational criticism. However, Kant's concept of "thing-in-itself" still contains remnants of skepticism, indicating that his system did not completely resolve Hume's challeng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Hume's skepticism is a necessary premise for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and Kant's response is both a correction of Hume's problems and an advancement beyond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This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not on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idealism but also provided a framework for continuous discussion in modern epistemology.

Keywords

Hume's Skepticism, Kant's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Transcendental Turn, Epistem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休谟怀疑论的核心命题及其破坏性

1.1. 因果关系的经验论解构

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第7节中对因果必然性的解构构成了其怀疑论的核心。他通过对人类认知过程的细致分析指出,所谓的“必然联系”并非如理性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是客观世界的固有属性,而仅仅是心灵在反复观察到相似事件序列后形成的心理习惯^[1]。在《人性论》第一卷“论知识和或然性”部分,他严格贯彻了其知觉理论的基本原则——即“一切观念都来源于印象”,并以此为基准展开了严密的逻辑推导。首先,在观察因果关系时,我们所能获得的印象仅仅是事件在空间上的接近性、时间上的先后接续性以及多次重复后的恒常联结。其次,休谟强调,在上述所有经验要素中,我们绝对无法获得关于“必然联系”的印象。正如休谟在原文中所言:“在任何一个实例中,任何对象间的关系中,没有任何东西能提示我们一个‘必然联系’的观念”。既然印象是观念的唯一合法来源,而经验观察中根本不存在必然联系的印象,那么传统形而上学视为因果本质的“必然联系”观念就既无法通过外部感知获得,也不能通过内省发现。最后,休谟据此指出,所谓“必然联系”的观念只能来自心灵自身的运作:当心灵反复经验到相似事件的恒常联结后,形成了一种由原因过渡到结果的“习惯”或“心理倾向”。因此,因果必然性并非客观世界的固有属性,而仅仅是主观的心理投射。这一认识论批判直接动摇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因为如果因果律只是主观的心理投射,那么建立在因果性之上的科学知识就失去了其普遍必然性的保证^[2]。更为深刻的是,休谟将这一分析延伸到归纳推理领域,揭示了从特殊观察推导普遍命题的根本困境:归纳法的有效性依赖于“自然的齐一性”这一未经证明的预设,而这一预设本身又需要

通过归纳来证实，从而陷入循环论证。这种认识不仅瓦解了经验科学的认识论基础，更在哲学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实然”(is)与“应然”(ought)的区分，即从事实描述无法逻辑地推出价值判断，这一洞见为后来的元伦理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构成了康德必须回应的关键哲学难题。休谟的这些分析不仅暴露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独断性，更迫使哲学重新思考人类知识的性质与限度，直接促成了康德从“独断论的未经审视的信念”中觉醒，并推动其发展先验哲学来解决休谟提出的认识论危机[3]。

1.2. 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瓦解

休谟在《人性论》第一卷“论人格的同一性”部分对实体概念的批判构成了其怀疑论对传统形而上学最为深刻的解构。他继续贯彻“一切观念来源于印象”的认识论原则，将“自我”或“精神实体”置于经验内省的显微镜下进行严格审查。休谟的论证步骤是：如果存在一个独立持存的“自我”实体，我们必定能拥有关于它的印象；然而，当我们在内省中试图捕捉这个“自我”时，所能遭遇的仅仅是冷热、痛痒、喜怒等一个个流动的个别知觉，而始终无法发现一个脱离这些具体知觉而独立存在的“自我”印象。正如休谟在原文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丝毫不能捕捉到一个没有知觉的‘自我’，我只能观察到那些流动的知觉本身”。同理，对于外部的“物体实体”，我们也只能获得一束不连贯的感性印象，而没有支撑这些属性的“实体”印象。由此，休谟得出结论，所谓的“实体”(无论是物质实体还是精神实体)都不过是一个缺乏经验基础的形而上学虚构，所谓的持续同一性仅仅是记忆和想象将离散的知觉链条联结起来所产生的心理虚构[4]。这一认识论立场直接挑战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所预设的思维实体，也否定了莱布尼茨单子论中作为实在基本单元的形而上学实体。休谟的批判揭示出，理性主义所依赖的实体概念既无法通过经验证实，也不能被清晰定义，本质上只是语言习惯产生的幻象[5]。这种彻底的怀疑不仅瓦解了传统形而上学试图通过实体概念来保证知识确定性的努力，更暴露了理性主义认识论的根本缺陷——即试图通过纯粹概念推演来获得关于实在的知识，却忽视了所有有意义的观念都必须最终能够追溯到经验印象这一认识论原则[6]。休谟对实体概念的消解，使得整个建立在实体-属性模式之上的传统形而上学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这一挑战如此深刻，以至于康德不得不通过先验统觉理论来重建主体的统一性，同时又在物自体概念中保留了休谟怀疑论的残余影响。

2. 康德对休谟问题的诊断与转化

2.1. 休谟的“唤醒”效应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明确承认休谟的怀疑论对其哲学思考的决定性影响，他将休谟比作唤醒自己从“独断论独断性预设”中觉醒的关键人物。这一坦承揭示了康德哲学体系与休谟怀疑论之间复杂而深刻的辩证关系：休谟对因果性、实体等传统形而上学核心概念的彻底解构，迫使康德认识到理性主义形而上学未经批判就假定人类理性能够直接把握事物本质的独断性[7]。康德意识到，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在缺乏对认识能力先验考察的情况下，就妄言能够认识物自体，这种独断态度正是导致形而上学陷入无尽争论的根本原因。然而，康德并非简单地接受休谟的结论，而是将休谟的破坏性怀疑转化为建构性批判的动力——他既同意休谟对传统形而上学独断性的揭露，又认为休谟的彻底经验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8]。正是这种双重批判的立场，促使康德发展出先验哲学这一独特的批判路径：一方面通过划定理性的界限来避免独断论，另一方面又通过先验范畴理论来挽救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从而在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独断论的同时，也克服了怀疑论对理性认识能力的彻底否定。

2.2. 先验哲学的问题重构

康德对休谟问题的创造性回应体现在其将经验心理学的怀疑论挑战提升为先验逻辑的认识论重构。

休谟将因果性问题限定在经验心理学层面,认为因果必然性只是心灵的习惯性联想,这一结论不仅动摇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有效性,更使形而上学陷入认识论危机[9]。康德敏锐地意识到,休谟的批判实际上触及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哲学问题——人类知识中那些既具有普遍必然性又能够扩展知识内容的命题(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成立。通过将休谟的“因果性”问题转化为“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先验哲学的核心问题,康德实现了认识论范式的根本转变:他不再像休谟那样追问心灵如何形成因果观念的心理过程(经验心理学问题),而是探究使因果性知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条件(先验逻辑问题)。这一范式转换使康德能够超越休谟的怀疑论困境,通过先验范畴理论证明,因果性等知性范畴不是从经验中归纳得出的心理习惯,而是使经验本身成为可能的主体认识形式。正是这种从经验描述到先验论证的转变,使得康德既接受了休谟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又能够在先验层面上重建科学知识的客观有效性,从而实现了对于休谟问题的辩证超越[10]。休谟指出,因果律并非事物本身固有的客观联系,而是人类心灵基于“习惯”和“联想”而产生的心理预期。我们只能在经验中观察到事件的“相继”,永远无法在经验中观察到“必然的联系”。康德完全同意休谟的这一洞察——即单凭纯粹的逻辑推演(分析判断),绝不能从前提中得出因果联结;因果律的必然性不可能从感觉经验中被直接“读取”出来,如果把认识仅仅局限在经验归纳上,因果律确实没有客观必然性。休谟的怀疑论摧毁了理性主义企图仅凭纯概念推演来超越经验、认识世界本体的妄想(如证明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宇宙起源)。康德同意休谟,认为纯粹理性一旦越出可能经验的界限,就会陷入二律背反,传统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不可能的。康德承认,没有感官经验作为质料,纯粹的概念只是空洞的形式。休谟坚持一切知识来源于印象和经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开篇便承认:“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他反对理性主义的天赋观念论(认为人有现成的知识天赋),认同在时间顺序上,我们的认识必须被对象刺激才能启动。

3. 康德先验哲学中的休谟遗产与超越

3.1. 先验范畴对因果性的重建

康德对休谟因果性挑战的最直接回应,集中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经验思维的第二类比中。在此,康德通过区分“主观的知觉相继”与“客观的事件相继”,重构了因果必然性的论证步骤。休谟的失误在于将主观的知觉次序等同于客观的因果次序。康德指出,当我们观看一栋房屋时,视线可以从左到右也可以从右到左,这种知觉的相继是主观任意的;但当我们观察一艘顺流而下的船时,我们对于船先在上游后在下流的知觉相继则是不可逆的、被规定的。康德由此发问:是什么使得后一种知觉相继被视为客观的?答案在于:我们只有通过因果范畴规定事件的先后秩序,才能将主观的知觉相继判定为客观的事件相继。正如康德在原文中所强调的:“我只有在对状态相继的领会的秩序上受到规定时,才能在现象中认识到状态的相继”。这表明,因果必然性并非来自对经验恒常联结的心理归纳,而是源自主体认知规则对现象的强制规定,是“经验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条件”[11]。这种先验转向的关键在于,康德将时间、空间(感性直观的纯形式)与范畴(知性的纯概念)共同构建为一个先天的认识框架,这个框架不是从经验中归纳得来,相反,它使得有序的经验认识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因果律的必然性不是来自经验世界的客观属性,而是源于认识主体所强加的先验形式——当我们认识现象世界时,必然要通过因果性等范畴来统摄感性材料,这种认识形式上的必然性保证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同时又避免了休谟怀疑论所揭示的经验归纳的或然性困境[12]。康德的这一理论既承认了休谟对经验主义认识局限性的深刻洞见,又通过先验哲学的建构为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提供了全新的哲学基础,从而实现了对于休谟问题的创造性转化与超越。

3.2. 理性界限的划定的分歧

休谟的彻底经验论将人类知识严格限定在印象与观念的范围内,认为任何超出直接经验内容的主张

都是可疑的形而上学独断，这种认识论立场不仅否定了因果必然性等理性主义的核心概念，更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合法性。然而，康德在先验观念论的框架中对休谟的挑战作出了创造性回应：他一方面接受了休谟对经验知识界限的严格限定，承认我们只能认识现象而非物自体，另一方面又通过先验哲学的建构为理性批判保留了可能性空间[13]。康德认为，虽然我们无法超越经验来认识物自体的领域，但通过对认识主体先验结构的考察，可以确立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普遍必然条件，通过划分现象与物自体，康德在限定因果范畴仅对经验有效的同时，证明了其在现象界具有严格的客观性。正是这种对认识界限的精确划定与对理性能力的批判性重建，使康德的先验观念论既区别于休谟的激进经验主义，又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独断论，开创了现代认识论研究的新范式[14]。

3.3. 怀疑论的遗留问题

康德哲学体系中“物自体”概念的设定引发了一个深刻的悖论：当康德宣称我们只能认识现象而无法认识物自体时，这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休谟式的怀疑论立场？虽然康德试图通过先验哲学为科学知识奠定普遍必然性的基础，但物自体不可知这一核心主张却在认识论边界处留下了一个无法消解的怀疑论阴影——正如叔本华所尖锐指出的，康德的物自体学说实际上承认了人类理性在把握终极实在时的根本局限，这种认识论上的不可知论与休谟对因果关系和实体知识的怀疑具有某种家族相似性[15]。逻辑实证主义者进一步质疑康德对“休谟难题”的解决方案是否彻底，他们指出，当康德将因果性等范畴视为知性的先天形式时，这些范畴的有效性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明，不过是用先验的独断论替代了经验的独断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如果按照康德自己的批判原则，我们何以能够确证这些先验范畴就是人类认识的必然形式？这种自我指涉的困境使得康德的体系始终面临着来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双方面的质疑，也表明他对休谟问题的解决虽然极具创造性，但可能并未如其所愿地完全超越怀疑论的挑战[16]。康德先验体系的内部潜藏着未竟的张力。当康德设定“物自体刺激感官产生直观”作为认识的来源时，他实际上已经跨越了自己划定的界限，先验地使用了因果范畴。这直接违背了康德自己立下的“范畴只能作经验性使用”的根本规则。这一内生于体系核心的悖论表明康德的先验重构并非对休谟问题的彻底终结，而是将其转化为先验观念论内部的系统张力。

4. 思想史视域下的评价

4.1. 休谟 - 康德关系的哲学史意义

休谟怀疑论与康德批判哲学的关系标志着近代哲学发展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这一转折不仅改变了形而上学的研究范式，更重新定义了哲学本身的任务与方法。休谟通过对因果性、实体和归纳法的彻底怀疑，将传统形而上学的独断性暴露无遗，其怀疑论像的激进性严重削弱了理性主义未经批判的认识论自信；而康德则在这种破坏性批判中看到了哲学重建的可能性，他将休谟的消极怀疑转化为积极的批判方法，发展出先验哲学这一全新的哲学形态[17]。这个转折的核心在于：康德认识到休谟的怀疑论实际上揭示了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不是要否定人类认识的可能性，而是要追问“认识如何可能”这一先验问题。正是通过对休谟问题的创造性转化，康德实现了从独断的形而上学到批判的形而上学、从盲目的理性自信到理性的自我审查、从对世界的直接断言到对认识条件的先验考察这一系列根本转变[18]。这一转折不仅使哲学从休谟怀疑论导致的危机中找到了出路，更确立了批判理性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态度，其影响贯穿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并持续塑造着当代哲学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在这个意义上，从休谟到康德的哲学发展，构成了西方哲学史上最具有生产力的转折之一，它既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又是哲学新范式的开端。

4.2. 后续影响

康德哲学所开启的先验转向虽然为认识论提供了新的基础，但其体系中的“未完成性”却成为后世哲学持续批判与发展的起点。德国观念论者如费希特和黑格尔敏锐地指出，康德哲学在物自体与现象界的二元划分中隐含着一个根本矛盾：如果物自体完全不可知，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断言它的存在？这种认识论上的不彻底性促使费希特将康德的先验自我推向绝对自我的观念论，而黑格尔则通过辩证法的逻辑消解了物自体的设定，将康德静态的认识论范畴转化为精神自我实现的动态环节[19]。与此同时，现代科学哲学对休谟归纳问题的持续讨论(以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为代表)表明，康德试图通过先验范畴来确保科学知识普遍必然性的方案并未真正解决归纳推理的合法性问题[20]。波普尔等哲学家指出，科学知识的增长并非建立在康德所设想的先验必然性之上，而是通过不断试错与证伪的批判性过程实现的，这一认识不仅延续了休谟对归纳法的质疑，更在科学方法论层面揭示了康德先验哲学的历史局限性。从德国观念论到现代科学哲学的这些发展，既是对康德哲学内在张力的不同回应，也展现了休谟-康德之争在哲学史上的持久生命力。

5. 结论

休谟与康德的哲学关系呈现出深刻的辩证性：休谟破坏性的怀疑论恰如一场必要的哲学批判性审视，其通过对因果性、实体等形而上学核心概念的彻底解构，清除了传统独断论的迷思，为康德的建构性批判创造了思想空间。康德哲学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既接受了休谟怀疑论对认识界限的严格限定，又通过先验转向为理性能力重建了批判性基础——休谟证明了我们无法像传统形而上学那样认识事物本身，而康德则发现了我们能够先验地认识事物向我们显现的方式。然而，这种辩证综合留下了一系列开放性问题：先验哲学虽然通过范畴理论赋予了科学知识以普遍必然性，但物自体不可知的设定是否仍在认识论边界处保留了怀疑论的残余？当现代科学日益揭示出人类认知结构的偶然性与历史性时，康德的先验形式是否还能保持其普遍有效性？这些追问不仅关乎对康德体系本身的评价，更指向形而上学在当代哲学中的可能路径——是在自然化的认识论中消解先验问题，还是在新先验哲学的框架中重新思考理性与实在的关系？休谟与康德的对话由此超越了历史语境，持续地为哲学思考提供着根本性的启发与挑战。

参考文献

- [1] Hume, D. (2007)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48) <https://doi.org/10.1093/owc/9780199549900.001.0001>
- [2] Kant, I. (1998)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Guyer, P. and Wood, A., 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81)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04649>
- [3] Strawson, P.F. (1966) *The Bounds of Sense: An Essa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Methuen.
- [4] Allison, H.E. (2004)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n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se*. Yal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2307/j.ctt1cc2kjc>
- [5] Guyer, P. (1987) *Kant and the Claims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24766>
- [6] Beiser, F.C. (2002) *German Idealism: The Struggle against Subjectivism, 1781-180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4159/9780674020702>
- [7] Korsgaard, C.M. (1996) *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554476>
- [8] 邓晓芒.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9] 张志伟. 西方哲学十五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0] Stroud, B. (1977) *Hume*.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1] Garrett, D. (1997) *Cognition and Commitment in Hume's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5097214.001.0001>
- [12] 李秋零. 康德著作全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13] Beck, L.W. (1978) *Essays on Kant and Hume*.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4] 韩水法. 批判的形而上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15] Bird, G. (2006) *The Revolutionary Kant: A Commentary on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Open Court.
 - [16] 杨祖陶, 邓晓芒.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17] Kemp Smith, N. (2003) *The Philosophy of David Hume*. Palgrave Macmill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1)
 - [18] 叶秀山. 哲学的希望[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 [19] Waxman, W. (2005) *Kant and the Empiricists: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0195177398.001.0001>
 - [20] 赵敦华. 西方哲学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